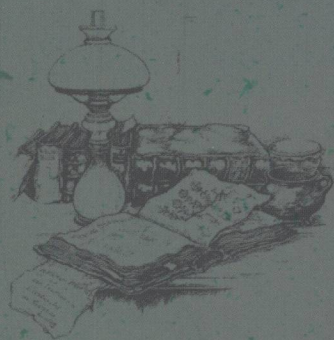


GUANGYI XIUCIXUE



安徽教育出版社



广义修辞学

(修订版)

谭学纯 朱玲 著



GUANGYI XIUCIXUE

广义修辞学 (修订版)

谭学纯 朱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义修辞学. 修订版/谭学纯, 朱玲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10

ISBN 978 - 7 - 5336 - 2799 - 7

I. 广... II. ①谭... ②朱... III. 修辞学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911 号

责任编辑: 丁昌龙

装帧设计: 心妍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580 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45.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3683078

作者简介

谭学纯(1953—),安徽芜湖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副院长。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修辞学、文艺美学等。著有《人与人的对话》、《修辞:审美与文化》、《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合著《接受修辞学》、《广义修辞学》、《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小说语言美学》等,发表论文160余篇。主要论文见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曾获首届“安徽文学奖”理论奖、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朱玲(1951—),女,安徽芜湖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修辞学。著有《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文学文体建构论》,合著《接受修辞学》、《广义修辞学》、《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等,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清华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辞书研究》等刊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合作成果获首届“安徽文学奖”理论奖、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初版自序

《广义修辞学》的写作构想和学术积累,经历了十多个春秋。准确地说,本书的理论定位和最后的框架设计,是在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前期研究之后才确定的。这三个阶段是:

1. 话语研究阶段
2. 接受修辞学研究阶段
3. 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研究阶段

现在回想这段呕心沥血的日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昨天是今天的准备。《广义修辞学》中的一些思想火花,是在以上三个阶段的前期研究中,逐步由星星点点而积聚、而照亮一个充满理论诱惑的世界的。

1986年初,《文艺研究》编辑部邀集在北京的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就小说创作中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方式举行座谈,并开辟专栏,组织文章进行讨论。《文艺研究》在这一年内连续推出的几组文章,既是一种起点较高的探索,也是文学理论关注话语研究问题的一个相对集中的文本记录。当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唐跃先生响应了《文艺研究》的“召唤”,陆续在一些理论刊物和一些文学杂志的理论栏目撰文,介入“文学话语”研究和“文学语言学”的学科建设。非常感谢国内诸多刊物先后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园地,它们是:《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报》、《文论报》、《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艺探索》、《文学评论家》、《南方文坛》、《当代文坛》、《艺术广角》、《理论与创作》、《文学自由谈》、《批评家》、《学术界》、《江淮论坛》、《百家》、《齐鲁学刊》、《民间文学论坛》、《北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东方丛刊》、《名作欣赏》、《上海文学》、《作家》、《山花》、《修辞学习》,等等。这一期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后来在1995年出版的《小说语言美学》中作了一些提炼和重构,它为《广义修辞学》提供了一个认识基础:**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和文本建构方式,存在着某种同构性。**这种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唐跃主编《艺术符号词典》的过程中,也一再浮现在我们的脑际。

1990年春,复旦大学游汝杰先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张洪明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唐发铨先生共同策划了一套《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丛书“出版者前言”提出的编撰设想是:“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

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我和唐跃、朱玲合著的《接受修辞学》有幸忝列这套丛书。书中,我们变换了研究视角:走出中国修辞学重表达、轻接受的传统研究格局,把研究重心转向了当时备受冷落的修辞接受理论。《接受修辞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反响。该书先后获首届“安徽文学奖”理论奖、安徽省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接受修辞学》的写作和增订,强化了我们一个认识:**修辞是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而来自语言学、文学、文艺学、美学等不同学科的关于《接受修辞学》的学术评价,则使我们探寻打通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有了付诸实际操作的信心。

199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先生和我共同策划了一套《对话丛书》,丛书包括《人与自然的对话》、《人与神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等,后者由我承写。这是一次心游太极的思考,也是写作《广义修辞学》之前的一次“广义对话”。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表明了自己对“对话”的理解:“对话不仅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诉求;对话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换,也是一种价值交换,同时还是一种感觉交换;对话不仅是语言、思想的馈赠,同时也包括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互参照。”这决定了《人与人的对话》的写作定位:**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和唐跃先生对文学话语研究的“两栖性”参与,到90年代初我和唐跃、朱玲合著《接受修辞学》,直到世纪之交写作《人与人的对话》,我们走的基本上都是一条跨学科研究的路子。十多年的积累、沉淀、过滤、提炼、反思和再认识,使一个有关广义修辞学的理论轮廓渐渐地在我們心中明晰起来,也使我们把反复思考的《广义修辞学》的理论切入点最终确立在**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因此,我们理解的《广义修辞学》和修辞界有学者谈到的“广义修辞学”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认为:**广义修辞学,不是狭义修辞学经验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

我们尝试把全书的理论构架和逻辑思路设计为:

1. 建立“修辞功能三层面”和“修辞活动两个主体”的“广义修辞学”理论框架,从理论和实践上区分:

第一层面——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

第二层面——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

第三层面——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

着重探讨修辞以何种方式参与话语建构、文本建构和主体建构，据此将修辞分析纳入“话语方式——文本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的层级构架，在更开阔的理论背景下，促进修辞学研究从“技”向“艺”提升，从语言学向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层面延伸。

与此同时，拓展“接受修辞学”的研究视野，建立“表达论”、“接受论”、“互动论”的系统研究格局。从学理上强调：完整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应该覆盖表达和接受两极，首次探讨“话语权和表达策略”、“解释权 and 接受策略”等理论命题和实践行为，并探讨其双向互动的运作机制，在研究视角的变换和流动中构建广义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2. 按照总→分→合的逻辑路径，展开多视角的研究思路。即——

总：修辞功能三层面和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

分：表达论——编码的视角

分：接受论——解码的视角

合：互动论——双向交流的视角

任何一种理论的自我修正、话语更新，都同时面对着传统资源和当下的学术前沿。赋予理论以现实形式的，是当下的创造，也是传统的馈赠。广义修辞学不拒绝狭义修辞学的理论资源，而是用新的理念充实、修正和开发狭义修辞学的理论资源，这是本书的写作立场。

皮亚杰曾竭力主张实现“学科的跨越”，实现专门化的研究之间的交流和互补，重建一种没有明显的学科之墙的开放性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修辞学是尝试在“学科的跨越”的意义上构筑自己的理论的又一次实践。

作为一种精神劳动，写作不仅是一种自我开发，也包含着一种期待：期待对话，期待赞同的和不同意的声音，期待这些声音对我们的再度激活……

九年前，我们在《接受修辞学》初版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一片目前还没有人走过的原野上行走，重要的不是走了多远，而是有没有踩出一条路。我们希冀众多的拓荒者共同踩出一条路。而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在这跋涉中留下几个幼稚歪斜的脚印，那就足以自慰了。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依然如此。

谭学纯

2001年6月

目 录

初版自序	1
------------	---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狭义修辞学内外: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	3
一、散点透视:域外修辞学研究	3
二、中国修辞学:多学科共享的理论资源	11
第二章 修辞功能三层面	19
一、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	21
二、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	32
三、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	42
第三章 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表达者和接受者	66
一、“修辞活动”:定义和角色分工	66
二、修辞角色的混杂、分化和转换	79
三、角色“在场”和“缺席”的修辞意义	85

第二编 表达论

第四章 话语权和表达策略	97
一、谁在言说·向谁言说·如何言说	97
二、话语权再分配和表达策略	117
三、表达策略和修辞话语的价值重建	126
第五章 修辞幻象	149
一、修辞幻象:语言制造的幻觉	149
二、修辞幻象的生成	164
三、修辞幻象的延伸	171

第六章 修辞原型	188
一、修辞原型:审美化的集体无意识	188
二、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一:“大”	190
三、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二:“家”	202
四、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三:“颜/色”	215
五、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四:“三/五”	221
六、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五:“鹰/蛇”	228

第三编 接受论

第七章 解释权 and 接受策略	241
一、解释的隐形权威和解释的自由	241
二、解释的自由和接受策略	259
三、解梦:话语模式及其解释权	263
第八章 修辞接受的特征	268
一、修辞接受的开放性	268
二、修辞接受的选择性	280
三、修辞接受的个体性	291
四、修辞接受的社会性	304
第九章 文学修辞接受:从话语到文本	314
一、文学修辞接受的语言起点和文本落点	314
二、文本修辞设计和批评指向	330
三、学科对话和文学话语读解空间的拓展	335

第四编 互动论

第十章 预设:表达和接受的认知前提	343
一、双向交流:角色预设·经验预设·价值预设	343
二、多重预设:正题和反题	354
三、预设和一个修辞诗学问题	361

第十一章 隐喻和隐喻义:从表达到接受	378
一、相似性:主观互联的合法化	379
二、隐喻化和非隐喻化:语义生成和修辞认知	389
三、隐喻化和非隐喻化:双向互动的文本建构	394
第十二章 双向互动:微观和宏观	400
一、微观分析:修辞话语的双向建构	400
二、宏观视野:修辞策略的双向调控	415
余论:基于修辞学学科交叉性质的观察与思考	429
主要参考文献	441
初版后记	443
修订版后记	444

第一编 总 论

- 熟悉狭义修辞学理论的人们最不可思议的,可能是后现代主义泛修辞观把迪斯尼游乐园的运作机制看做一个话语行为系统。(第一章)
- 哲学家说“人是语言的动物”,是相对于非语言动物的一种界定。我们说“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是针对人如何更有效地通过语言证明自己、走近他人的一种描述。应该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人际交流并不是把存在着的世界转化为抽象的表述,而是把真实世界转换为似真、甚至失真的修辞世界。这意味着,在更多的情况下,主体以修辞的方式“在场”,或者说,修辞对主体“在场”的影响,比不假修饰的语言的影响更大。(第二章)
- 修辞表达完成之后,只留下物态化的句子或文本,这是表达者建构的最后的物质现实,也是接受者面对的第一现实,接受者需要从这第一现实建构成自己的心理现实,以此去接近表达者心理现实中那个意象化的审美结构。所以,修辞活动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建构审美现实的言语活动。(第三章)

第一章 狭义修辞学内外： 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

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研究虽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关怀之路，但也有共同点，即在狭义修辞学研究中，蕴涵着广义修辞学的思想资源。

一、散点透视：域外修辞学研究

后现代主义从修辞走向泛修辞，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切文化形式和文化现象：

后现代主义将一切符码化、话语化，实质上是将一切修辞化。这样，修辞批评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狭窄的、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或演讲，而是一切文化形式，包括批评本身：它可以是各种大众传播形式，如电视、广告、公关；它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的或抽象的文化现象，如服装、建筑、习俗。索尼娅·福斯(Sonja Foss)和安·吉尔(Ann Gil)的《米歇尔·福柯的修辞认知理论》讨论了从福柯的作品中引申出的五种理论成分——理性行为、规则、角色、权力和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者借助这种理论框架对迪斯尼乐园进行分析。分析中，迪斯尼被看成是一种话语行为系统，这些话语行为清晰明了地表达了一种特定的知识或真理。^①

熟悉狭义修辞学理论的人们最不可思议的，可能是后现代主义泛修辞观把迪斯尼游乐园的运作机制看做一个话语行为系统。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可能让习惯于按照狭义修辞观来理解修辞的人们感到困惑，也许，“什么是修辞”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什么不是修辞？”不是吗——

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的“圣战”演讲是战争修辞。美国前线的“沙漠风暴”和后方的“沙漠安慰”，也是战争修辞。

总统竞选人在竞选期间亲吻女选民抱着的孩子，是行为修辞。

^① 常昌富：《导论：当代修辞学批评模式概述》，见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再看这两本论文集所选的一些代表性篇目：

- 菲希尔：《叙事范式详论》
 西蒙斯：《要求、问题及策略：社会运动中的规劝理论》
 布朗：《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修辞》
 克劳德：《沙漠安慰行动》
 鲍曼：《想象与修辞幻象》
 格里芬：《历史运动修辞学》
 约翰斯顿：《论修辞伦理》、《修辞、相交面及他者》
 福斯等：《米歇尔·福柯的修辞认知理论》
 司各特：《论修辞的认知性：十年之后》
 奥奈：《超越解构：象征与社会现实》
 麦凯罗：《批评修辞：理论与实践》
 布拉克：《修辞学批评：方法之研究》
 麦杰：《文本、泛文本与当代文化碎片》
 雷夫：《语言构成的世界：文本批评的思考》

这些篇目中的修辞概念，分别指向了文本和认知。司各特更是宣称：修辞“必须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把它看成人类理解其环境的一种潜能”。^①

在凯罗·阿诺德看来，修辞不是运用语言提高交际效果，而是运用符号手段来达到争取自己或他人信奉某事物的目的，而这对于认知过程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修辞不是只是使真理更有效，而是具有认知功能的，是创造真理的。”^②在我们看来，“修辞创造真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修辞在创造关于真理的表述的同时，以语言的方式参与了抵达真理的认知过程，当然，这个真理不是终极的，而是相对的。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套高品位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其中《解构之图》的作者保罗·德曼，是盛极一时的“耶鲁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解构主义批评对隐喻和修辞的重视远远超出了修辞技巧，他的

① R·司各特著，顾宝桐译：《论修辞的认知性：十年之后》，见K·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19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 R·什尔维兹著，顾宝桐译：《修辞的“认知性”：对“新修辞”运动认知论的淡化》，见K·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1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代表作之一《浪漫主义修辞学》，书名就体现了与狭义修辞学的区别。《解构之图》收入的修辞论有：

《时间性修辞》

《符号学与修辞》

《隐喻认识论》

《论尼采的转义修辞学》

《黑格尔〈美学〉中的符号与象征》

这里，保罗的研究，更多地属于修辞哲学，而不是修辞技巧。

在康德哲学中，尤其是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和知解力活动同时存在于诗歌和修辞学之中，所以，这位哲学家认为，诗歌和修辞学都是“自由的”和美的艺术。康德所说的“自由”，是审美的自由，也是主体的自由，因此，康德视野中的修辞学，也更多地属于修辞哲学，而不是修辞技巧。

对照一下古典修辞学，人们也许会觉得，泛修辞观中的“修辞”似乎已经面目全非。

古典修辞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是在“技”的层面探讨问题的，作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专著，亚氏的《修辞学》实际上研究的是修辞术。诡辩派认为“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亚氏则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因此，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修辞术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讲中运用理念、人品、情感，可使演讲具有说服力。直到现在，我们在西方国家竞选活动的演讲和辩论中，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修辞的力量。

人，说服别人也被别人说服，即使隐士也不例外。约翰斯顿认为，隐士将自己置于劝说的影响范围之外，这只是表象：

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个隐士找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说服他接受某个东西。假如我们说服不了他的话，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动物要么从来就不是人，要么就是已经失去人性。^②

①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② H·W·约翰斯顿著，顾宝桐译：《修辞理论》，见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2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我们赞同隐士不能置身于劝说的影响之外,但我们不赞同约翰斯顿的论证。实际上,说服人并被人说服的“人”,不宜理解为单个的、具体的人,而应理解为自己或他人的言谈所体现的价值系统,人在言谈中表达一种价值系统,也在倾听中接受一种价值系统,隐士的隐居行为,正是接受了一种价值系统,他的隐而不出,本身也是向他人表明自我在场姿态的修辞行为。

新理论往往在旧有理论的母体中孕育。

19—20 世纪之交,西方修辞学从古典修辞学以演讲为核心的研究,转向对语言文字作品的研究,而且有了广狭义之分:狭义修辞偏重研究作品言语技巧,广义修辞偏重研究整个作品的艺术设计,在某些方面与诗学交叉。

这种交叉,既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研究者的实际操作中。

身兼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两栖学者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不仅把一系列修辞学术语引进了文论话语,也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整合进文艺学研究,他们研究隐喻、转喻、暗喻、象征,不滞于语言,也不拘于文学,而是在话语建构和文本建构的不同层级之间穿行。从研究方法说,形式主义批评的科学实证主义色彩,也应该归于研究者们坚实的语言学功底。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研究、类比方法研究、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结合的研究等,源自语言学、又超出了语言学。虽然有人不大赞同他们把语言学研究在文艺学中的运用推向极端,但是从打通学科界限的意义上说,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贡献还是应该得到承认的。一方面,他们的语言分析、修辞分析丰富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研究又延伸了修辞学的研究空间。例如,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们经常提到的“陌生化”,如今已经比较广泛地进入了修辞理论,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形式主义文论话语,也需要调动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双重经验。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则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向修辞认知趋近。

1953 年,唐纳德·布莱恩特发表的《修辞学:功能与范围》,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的重要文献,一般认为,布莱恩特对亚里士多德的推崇和继承是显而易见的。但正是在布莱恩特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中,透露了修辞向认知靠拢的信息。当布莱恩特强调修辞功能是“使观念适应人,使人适应观念”的时候,^①已经包含了修辞参与主体建构的思想萌芽——

“使观念适应人”,是思想的修辞化。

^① 常昌富:《导论:20 世纪修辞学概述》,见 K·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10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使人适应观念”，是建构修辞化的言语人生。

修辞的认知功能，指的是修辞活动如何介入主体的认知发生，唐·伯克曾经提出“修辞感性”说，按照罗伯特·司各特的解释，就是人需要以修辞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也以修辞的方式形成关于世界的审美化认知。

人们很容易接受认知先于修辞而存在的说法，但是实际上，认知往往以修辞的方式“在场”，认知是在修辞中走出混沌、走向澄明的。修辞活动包含了表达者和接受者的经验体系、认知模式，以及施受双方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主体经验来自我们的感觉器官所接受的外部信息，外部信息经过主体经验的过滤和整合，凝定成某种认知框架。不同的主体，由于经验世界的不同，有关对象世界的认知必然不同，对象世界通过经验世界形成的修辞活动也必然不同。反过来说，修辞表达，反向地透露出表达主体以什么样的认知模式“在场”，修辞接受，反向地透露出接受主体以什么样的认知模式逼近对象。认知框架比较稳固，经验世界的调整就会相对缓慢，反之，经验世界的调整就相对容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孩子能比成年人更快地与外部世界建立新的对话关系。

承认修辞作为认知方式，并不意味着模糊修辞和哲学的边界。修辞和哲学，作为认知方式，各有自己的客观规定，但也有共同点。沃尔特·卡尔顿在对一批修辞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之后，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发掘修辞的认知功能。

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理论重构的声浪中，新修辞学的思想已经悄然出现。

1950年，K·博克提交给一次学术会议的文章《修辞学：新与旧》，用两组关键词概括了传统修辞学和新修辞学的区别：

传统修辞学	新修辞学
规劝	认同
有意识	有意识/无意识

在博克看来，传统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是有意为之的修辞设计，是自觉的修辞行为，追求直接效果。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其中包括有意为之的修辞设计，也包括无意识的趋同心理，后者是不自觉的修辞行为。

1965年，布拉克《修辞学批评：方法之研究》出版，再次体现了走向广义修辞学的迹象。书中对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批评，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广义修